

693297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

(一九九二年度)

金家滋 陆红妹 编
赵秀英 张 莉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前 言

近年来，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发展迅速，发表的论文，每年数以千计。这些论文分载于各类刊物中。由于目前全国发行的刊物数量很大，发行的渠道又各不相同（有的公开发行，有的自办发行，有的是内部刊物），就一地、一单位而言，若要见到所有有关刊物，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单位不可能全部订阅，也不可能期期不缺。这无疑给研究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即便是能见到所有刊物，面对如此大的量，一期期去翻阅，一篇篇去查找，耗时费力，亦常使研究者望而却步。

我所图书资料室每年都订阅大量专业刊物。在编辑此《汇编》过程中，我们除翻阅了本所所藏刊物外，还查阅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当年度社会科学的有关刊物，并参考了其它单位收藏的刊物。

编此《汇编》的主要难点在于确定选文范围。这实际上要求回答“什么是民族史？”“民族史都包括哪些范畴？”等问题。这本是一个较大的科研课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获统一认识。当然，核心问题比较清楚，其边沿问题，特别是与相邻学科的交叉问题实难把握。诸如，民族史与民族学、民族古代文学、民族古文字、民族古籍、民族地区考古等文章的区分与归类；民族史与地区史（如新疆史、云南史、台湾史、东北史等）、边疆史、朝代史（如辽金史、元史、清史等）的划分与界定等，都是难于断然确言的。为了确保本《汇编》的内在质量，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本《汇编》的编选原则。

本《汇编》分卷主要以民族，一般以民族发源地为标准。如蒙古族、满族虽曾统一全国，仍按其民族分别归入北方卷和东北卷；再如西辽，按地域应入西北卷，但我们仍按其民族（契丹）归入东北卷。

类此，讨论云南蒙古族和西蒙古的文章皆归北方卷。羌族问题比较复杂，古羌的活动重心虽在西北，然其活动大范围仍包括西南地区，鉴于今羌活动中心在西南地区的情况，故将讨论羌族的文章全归入西南卷，以便集中查找。有关东夷等文章附入东北卷后。

鉴于研究北方民族文章量很大的情况，考虑到读者查找方便，本《汇编》将整个北方分订为东北、西北、北方三卷。这里的“北方”是指生息于蒙古高原一带的民族，如匈奴、柔然、蒙古族等，而综合研究三北民族的文章则收入综合卷。

为扩大读者视野，本《汇编》还酌情收了港台刊物的研究文章。由于共知的原因，这些文章在观点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一并印出，仅供研究工作参考，特作说明。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不详尽占有资料，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为了科研工作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的《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1992年度），经过一年的努力，又与读者见面了。

本《汇编》采用原文静电复印汇集装订形式，按年度分卷汇编，本年度分为七卷：综合卷、北方卷、东北卷、西北卷、西南卷、中·东南卷、西藏卷。各卷再依文章多寡分册装订。

在我们编选的过程中，曾得到于宝麟、刘凤翥、任一飞、杨绍猷、祝启源、黄庭辉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业务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本《汇编》一定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经便在下年度的编辑过程中改正。

《中国民族史论著汇编》编委会

凡 例

一、本《汇编》是为研究与教学人员提供的基本资料，收录范围包括对民族源流的探讨和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二、“民族”区别于“地域”。诸如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台湾”、“东北”、“西北”等主要从地区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其中内容重点谈论民族的则酌情收录。

三、对在全国建立王朝的民族政权（如元、清），一般问题作朝代史处理，本《汇编》只收其中有关民族的文章。

四、关于民族古代文学与古文字的文章，如主要从文学角度分析或单纯的文字解读一般不收，如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民族史实和民族历史人物，利用民族古文字研究民族史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五、涉及民族古籍（例如《蒙鞑备录》、《契丹国志》、《高丽史》、《南诏野史》、《辽史》、《金史》、《元史》、《清史稿》、《清实录》等等），包括民族文字古籍（如《西南彝志》、《满文老档》、《福乐智慧》、《格萨尔王传》等等），如从语言文字或文学角度的研究文章一般，如从历史或史料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考据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六、一般考证地名沿革的文章不收，如对民族史关系极为密切的则收。

七、关于民族地区考古文章，如单纯从考古角度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一般不收，如利用考古资料研究民族历史问题的文章则在收录之列。

八、鉴于文章量过大，受经济条件限制，本《汇编》决定重点收录研究性文章。对于一般性的书刊介绍（尤其是广告式的介绍）、会议报导（尤其是新闻式的报导），以及宣传普及性的介绍文章一般不收。但对学术性强的书评，以及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概况、研究综述等酌情收录。

九、港台文章因是竖排，为装订方便，皆在各册之后。

目 录

党项迁都兴州的深远意义——宁夏平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机·····	陈明猷
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	
——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	邓如萍著 聂鸿音 彭玉兰译
试论西夏的历史分期——兼谈西夏立国方针的转变·····	李 蔚
论宋夏争夺西北少数民族的斗争·····	李华瑞
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	孟 楠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史金波
略论兴庆府在西夏建国史上的历史地位·····	周伟权
西夏·佛教·皇权·····	张伯元
大夏国都统万城兴起在地理基础·····	李学江
西夏在中国内亚关系中的角色·····	(美)关 顿著 朱悦梅译
西夏时期河西走廊佛教的兴盛·····	刘建丽
论隋与突厥关系的发展进程·····	赵云旗
唐与突厥和亲述论·····	崔明德
西突厥汗庭考·····	林梅村
试论阿尔泰突厥汗国及其相关问题·····	陈良伟
回纥汗国兴起前后与唐朝的关系·····	程溯洛
拔悉蜜汗国及其相关的问题·····	陈良伟
840年之后回鹘与吐蕃的关系——维藏民族关系史研究之二·····	尹伟先
关于回鹘西迁若干问题辨正·····	林 翰 高自厚
甘州回鹘和摩尼教的关系	
——兼述东西贸易中的宗教因素·····	钟进文
古代突厥回鹘等民族的“北旋舞”·····	孟 楠
叶尔羌汗国的衰落和覆亡(上、下)·····	魏良弢
叶尔羌汗国的体制和官制·····	魏良弢

西域史上的一个幻影——“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考实·····	魏良弢
元代中国穆斯林及宗教活动管窥·····	马志福
13—14世纪西部蒙古汗国伊斯兰化的几个问题·····	丁明俊
新疆哈密의 伊斯王国	
——哈密郡王统领史····· (日) 佐口透著 邢玉林 阿拉腾奥其尔译	
关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民法问题——契约文书探讨·····	陈国光
1911—1951年的云南回族伊斯兰教组织·····	沙非亚
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	
——中国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撞击·····	从恩霖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论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历程·····	秦惠彬
临夏八坊清真寺概述·····	马占奎
清真寺研究漫话·····	姚复兴
记北平清真书报社·····	运子薇
伊斯兰教圣徒崇拜溯源·····	高永久
伊斯兰教在中国：西方的研究····· (瑞士) 雅克·沃登伯格著 周燮藩译	
中国伊斯兰教寺墓考察记·····	马以愚遗著
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刍议·····	马忠杰 米寿江
新疆伊斯兰教的初期文化·····	桑 荣
台湾伊斯兰教·····	黄陵渝
元代的甘肃回回人·····	高占福
明代入附回回姓氏汉化考·····	和 葵
明代西域入附回回的职 业 结 构·····	和 葵
从海富润案件看乾隆对回族的统治政策·····	马汝珩
论清朝对哈密吐鲁番回部的民族政策·····	黄建华
1760—1860年新疆回民简况····· (日) 佐口透著 章 莹译	
额敏和卓以后诸吐鲁番回部郡王事略·····	黄建华
清代伊犁回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王希隆

清代回族的一个侧面·····	(日) 中田吉信著 陈键玲译
中国回族医药文化探讨·····	张俊智 陈卫川
回族发展的历史特征及其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赖存理
回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及穆斯林文化的联系与区别·····	李佩伦
回族的古代教育·····	谷文双
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	杨志玖
我国西南地区回族最早来源探讨·····	黄运海
东北地区回族源流考述·····	那晓波
关于评价新疆回族、维吾尔族起义的几个问题·····	吴万善 张玉峰
云南回族的对外贸易·····	马维良
云南回族与滇缅贸易·····	何 平
略论临夏回族文化·····	华进明
西藏回族与清真寺研究的若干问题·····	房建昌
青海回族土司——冶土司评述·····	马 忠 马小琴
四川回族的历史和现状·····	张泽洪
浙江嘉兴的回族·····	刘重尚 郭成美
嘉兴回族金氏家三代人考略·····	郭成美
大厂回族考·····	杨学峰
大厂回族的今昔·····	杨宝军
海南回族文化散论·····	李鸿然
略论回族文化的内涵·····	余振贵
对《山东部分回族族源问题探索》的一点商榷·····	马 皓
略谈回民支队在解放吉林中的贡献·····	回韵琴
《雍正训谕碑》与清初北京回民·····	姜纬堂
白彦虎与原苏联东干族·····	冯钧平
浅谈土族地区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原因·····	秦永章 李 丽
浅析裕固族地区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并存状况·····	贺卫光

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	刘迎胜
元代畏兀儿人内迁及其原因初探·····	田卫疆
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几个问题·····	王 焘
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马价, 丝绸价与贸易的比值问题·····	王 焘
柯尔克孜族名沿革·····	乌 兰
清季布鲁特(柯尔克孜)诸部的分布·····	潘志平
东北柯尔克孜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和民族文化·····	于学斌
嫩江流域柯尔克孜族源考·····	杨志军 于学斌

西北

党项迁都兴州的深远意义

——宁夏平原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机

陈明猷

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党项部首领李德明（公元982—1031年）将本部割据地区的军政中心，由灵州（今吴忠市附近）迁到怀远镇（今银川市老城），并改称之为兴州。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奠定了后来西夏王朝两百年建都兴庆府的基础，扩大和加速了宁夏平原的开发，而且开创了11—12两个世纪以兴庆府为中心的西北各族经济文化密切联系的新局面，影响深远。这是党项西夏王朝对祖国历史的重大贡献。

一、确立了兴州的西北军政中心地位

当代银川市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是中国西北屈指可数的几个辐射面很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这个地点之逐渐达到如此重要地位，是970多年前李德明定都兴州时开始的。在此之前，这里一直只是中原封建王朝的河外边裔而已，连一个边防重点也算不上。

追溯历史，远古商周时代，整个宁夏平原是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直至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军占领了包括宁夏平原在内的所有河套以南地区，并且“因

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岩画简述》，译文载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二辑第109页图五，1980年。

图16、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图。《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189页图125，文物出版社。

图17、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55页图155，第54页图151，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18、鄂尔多斯式青铜饰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176页图123（4），文物出版社。

图19、商代铜器花纹——夔纹。翦伯赞：《先秦史》第229页插图2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图20、蒙古乌兰乌德“鹿石”动物图案。道尔吉：《蒙古岩画研究简史》，译文载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二期第122页图6，1980年。

图21、22、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95页图289，第11页图010，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23、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15页图022，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24、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7页图001，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25、26、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20页图041，第26页图071，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27、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23页图058，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28、贺兰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第14页图021，宁夏人民出版社。

重障碍。李继迁和潘罗支，这两个敌对的首领，同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凉州之战中丧生。天禧四年，契丹圣宗也曾亲自率兵50万直逼凉州。可见凉州当年是各方激烈争夺的战略目标。党项既要西征凉州并进而控制河西走廊，自然必须将军政大本营由河东西平府迁到河西怀远镇来。怀远镇成党项军政中心后的10年里，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公元1003—1048年）先后率军攻占了河西走廊上的凉、甘、瓜等州，实现了党项多年梦寐以求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鹑锐兵”局面，构成了党项王国强大的西翼，史称“灵夏之右臂成矣”！④应当说，党项扩张西部领土的军事胜利，就是它迁都兴州决策成功的一个体现。

元昊显道二年（公元1033年）改兴州为兴庆府，西夏建国后即以此为国都（公元1205年又改称中兴府），这使宁夏平原河西地理上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西夏全国22个州，其中兴、永定、怀和顺等5个州都在河西，而河东仅保留一个古老的灵州。西夏共有军队50万人，也大部分驻扎在都城周围，即以7万兵卫护兴庆府，5万兵部署在西侧贺兰山。这样河西共驻军12万，而河东灵州仅驻军5万，改变了自古以来宁夏平原黄河两岸东重西轻的军事、政治，以至经济、文化的布局。于是，兴庆府成为一个人口密集、地位重要的城市，实现了本地由河外边裔而跃升为西北区域人文中心的大转变。

兴州——兴庆府，作为党项——西夏的都城连续两百多年（公元1020—1227年），其城镇建设空前发展。今日银川市及其四郊留存的大量别具特色的西夏遗址和文物就是明证。

西夏定都兴庆府，其影响远不限于西夏一代。更重要的是，由此开始的本地区政治中心移到河西这一状况，延续千年没有改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了。

在元代和清代，整个宁夏平原成为统一的大帝国的腹地，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西夏以后仅仅明朝一代，宁夏地区最后一次作为边防重镇存在（防御的是河套鞑靼）。但明代同西夏以前秦汉隋唐的边防形势已大不相同了。明代宁夏的边墙（即长城）已经包容了整个宁夏平原，不再是秦汉时代那样“因河为塞”了。其次，作为明代九边之一的宁夏重镇设在河西，而唐宋以前的边防重镇河东灵州在明代只是宁夏镇所辖的一个千户所了（发展至当代，河西密集着3市4县，而河东仅有1市2县）。

总之，党项定都兴州，在银川市和宁夏平原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的转折点。

二、扩大了宁夏平原农田水利的开发

古代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农业的发展十分曲折缓慢。这一方面是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严重制约，例如汉代的高渠、北魏的艾山渠、西夏的昊王渠和明代的靖虏渠，都开凿半途而废。而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受到复杂多变的军政形势的严重干涉破坏，特别是河西地区更是如此。

同前述军政形势相适应，西夏以前河东灵州的农田水利事业远比河西发达先进。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太宗接见敕勒族11部的群众千人，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肃宗继承帝位，两事都发生在灵州，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灵武兵食完富”⑤的缘故。唐代灵州的灌溉面积史籍中有许多具体记载：如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灵盐节度使李昕组织疏浚旧光禄渠（即今河东汉渠），“溉田千余顷”⑥。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灵州回乐县开特进渠，“溉田六百顷”⑦。此外，灵武县北千金坡一带，“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余顷”⑧，等等。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唐代的著名诗句——“塞北江南旧有名”，是

特指河东灵州而言的（原诗题为《送卢潘尚书之灵武》，韦蟾作，见《全唐诗》卷566）。

但是河西地区的灌溉面积，西夏以前的没有具体记载。其实宁夏平原北部（即银川—吴忠平原）中，河西的土地面积占70%多，是河东的两倍多。古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贺兰“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贍给军储也”^⑩。但西夏以前受分裂的军政形势影响，河西的农田水利未能稳定持续开发，只有在党项定都兴州之后，前人的理想才有可能逐渐实现。

西夏两百年中，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建设成绩应该是很可观的，但是没有留下当时灌溉面积的具体数字，我们只能从元初的文献中间接地看到其大概。“西夏濒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兴者：一名唐来，长袤四百里；一名汉延，长袤二百五十里。其余四州又有正渠十，长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计溉田九万余顷。”^⑪。文中所谓“九万余顷”显然夸张失实。明弘治《宁夏新志》卷2记载为“万余顷”，才接近史实。唐来和汉延是西夏境内两条最长的渠道，都在兴庆府左右。这表明西夏时宁夏平原河西农田水利的开发成绩已超过了河东。此外还有未能开凿成功的昊王渠，其遗迹同今日贺兰山麓的西干渠相近，由此可见西夏当年开凿河西水渠的规模何等宏大。

西夏以后，历代相继全面开发宁夏平原的农田水利，渠道逐步向北延伸，灌区逐步向平原两翼扩展。由于河西地域宽广，而且黄河水道多次东移，河西的灌溉面积和人口数终于都远超过了河东，下列两表具体地表明了这点。

表1 明代以后银吴平原黄河两岸灌溉面积简表

单位：万亩

年 代	黄 河 西 岸	黄 河 东 岸	合 计
明 嘉 靖	118.27	16.30	134.57
清 嘉 庆	153.10	26.00	179.10
民 国 25 年	117.05	25.50	142.55
1949年	118.93	25.50	144.43

表2 明代以后银吴平原黄河两岸人口数简表

单位：万人

年 代	黄 河 西 岸	黄 河 东 岸	合 计
明弘治十四年（1501）	10.38	1.55	11.93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78.09	28.48	106.57
民 国 17 年（1928）	21.84	9.42	31.26
1949年	37.60	12.14	49.74

这两表中的数字虽然只是个近似的概略^⑫，但可由此看出西夏以后宁夏平原社会发展的大概进程，特别是河西地区发展更大。

三、加强了西北区域的经济联系

西夏疆土辽阔,适应加强内部统治和对外交往以及战争的需要,境内外的交通空前发展。

以兴庆府为轴心,交通干线辐射四方,概略地说:1.向东北方,在怀州渡过黄河(对岸为今灵武县横城),向东北经河清军(今内蒙古东胜)直到金中都(今北京),甚至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2.向北方,经定州、克危山(今石嘴山),北上至白马强镇军司(今内蒙古吉兰泰)。3.向西北方,越贺兰山至黑山威福军司和黑山镇燕军司(今甘肃张掖北)。4.向西南方,经顺州(今青铜峡市北)和峡口,沿黄河北岸至应理州(今中卫县),可再西去河西走廊各州。5.向南方,经静州(今永宁县南)东渡黄河到灵州。

灵州是古老的交通枢纽,可东至盐州,东北至丰州,北至顺州,西经应理州至凉州,南经蒲洛河和青冈峡,至环州和庆州,可达关中。此外,兴庆府南端有另一个交通枢纽,即天都山(在今海原县西)。它北通鸣沙、灵州,东北达韦州、清远军。东南经临羌寨、平夏城,至镇戎军(今固原县)。南经宁安寨、得胜寨(今西吉县将台)、静边寨(今甘肃静宁县),可达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天都山驻有西夏左厢神勇军司,也是西夏进攻西南方的军队集散地,史称此地“介五路间,羌人入寇,必经彼点集,然后议其所向”^⑩。

西夏境内交通的发展,为广大西北地区的经济联系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首先,这使调剂各地粮食余缺,或者迁移灾民避荒等事成为可能。如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七月,银夏诸州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日赤如火,田野龟拆,禾麦尽稿。乘常遣官祈禳二十日不应,民大饥。群臣咸请赈恤,乘常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⑪这是由西夏西端运粮赈济东端。25年后,调了个头,由东边向西边运粮赈济。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九月,瓜沙肃三州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水草乏绝,赤地数百里,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监军司以闻,乾顺命发灵夏诸州粟赈之。”^⑫

在对外交往方面,由于西夏自身经济实力十分薄弱,不能不指望同邻国的贸易来满足本国对粮食和其他物品的需求。这决定了西夏不可能是闭关锁国的。(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略带偏激地指出:西夏“与诸蕃部落杂处于旱海不毛之地,……是以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⑬。)

尽管北宋时常停止对西夏的和市与岁赐,但双方毕竟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先后设过许多榷场。《宋史》卷186食货志记载:“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缗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獬羚角、硝沙、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可见榷场之外,宋夏边境上的民间私下交易也很多,如当年司马光所言:“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⑭

在所有商品交易中,以盐易粮对西夏经济尤有重大意义。兴庆府东边的盐州和灵州盛产食盐。史称:“诸羌部落树艺殊少,但用盐池与边民交易谷麦。”^⑮但北宋对西夏采取经济封锁政策,禁止夏盐入境。宋夏边境冲突也常因此引起。

此外,虽然北宋和辽多次明令禁止铜铁和兵器流入西夏,但西夏还是通过受赐、贸易和偷运等多种渠道获取这类重要物资(绍兴九年和二十年,金国两次放松对西夏输出铜铁的禁令)。虽然西夏也曾自己铸造过西夏文的钱币,但其品种和数量都极少,主要还是大量输入北

宋铜钱，直接作为自己境内流通的货币。据近年在古兴庆府附近的贺兰山大风沟和榆树台的考古发现，西夏窖藏1.4万枚钱币中，北宋钱币占86%以上，而西夏钱币仅占1.16%。此外还有大量北宋钱币遍布当年西夏境内地下^⑧。这说明了西夏统辖下的广大西北地区，同中原北宋王朝及其他邻国在经济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而西夏都城兴庆府在其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四、促进了西北各族文化的融合

“西夏人勇健，契丹人迟缓，吐蕃人信佛，汉人爱俗文，回鹘饮酸乳。”

这是一段仿汉文《千字文》的西夏诗^⑨。它所歌唱的正是西夏人口中的五个主要民族。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集体，这首先是由于它攻占广大领土之前，各地原有居民的民族属性就是各异；而西夏建国之后，境内外之间，通过越界、投奔、俘虏等多种方式，各族人口流动频繁，而且流量很大。许多因素都促使西夏境内形成多民族杂处状态。

邻国交战不免时有屠杀，但也常有招降纳叛，或俘虏对方军民以及事后交换俘虏的事。如西夏曾两次归还北宋在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永乐城之役中的被俘人员，即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归还士兵318人，第三年又归还吏士149人。反方向的人口回归也不少。如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西夏叛将李讹移，任北宋环州定远大首领20年之后，领其子遇昌及部众万余人回归西夏。西夏同辽、金、吐蕃之间，也常有这类事件发生。

西夏从法律上鼓励邻国军民投奔西夏。《西夏法典》规定：“关于征集异国人。若异国人携其同族来降，若随其来人有十名以上后备者，则可任命其为带卒头领”，“任何异国人降附我朝者，应在其自愿臣服之处，将其编为辅正军杂役”。又规定：“那些远离边境地方，同别国并无严格界线，我国全仗同吐蕃人、回鹘人和鞑靼人、女真人所建立之睦邻关系。如有寻找水草之牧户或猎户而走近两国边境，我国远近哨卡应命其返回原处，留住不愿返回者。”^⑩可见西夏境内并没有严格的民族畛域。

《西夏法典》中没有限制不同民族间的通婚。而事实上西夏党项王族同外族通婚的事例屡见不鲜。如同契丹通婚者有：李继迁娶义成公主，元昊娶兴平公主，乾顺娶成安公主。同吐蕃通婚者有：谅祚以本族女嫁禹藏花麻，梁太后以女嫁苻通比，梁乙通之子娶阿里骨之女，西夏宗室女嫁赵怀德（即讹移）。同汉族通婚者有：谅祚娶梁氏，乾顺娶任得敬之女，后又娶罗氏。此外，安全向蒙古军献党项族女子求和，等等，不一而足。近代学者张澍在其《西夏姓氏录》题记中写道：西夏“时附辽，附宋，并时附金，其时臣下姓氏亦有与中国同者。其异者皆蕃语，不得其受氏之原也”。这表明，我们已经无法从姓氏上确切识别西夏官员们原来的民族属性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西夏境内非但民族众多，而且彼此在密切的交往中出现融合的趋势。

同上述多民族杂处状态相适应，西夏境内同时容纳并融合着各地域各民族的多种文化。虽然西夏统治集团中关于采用汉文化或者坚持党项旧传统的问题，有长期反复的斗争（常表现为帝党和后党的夺权斗争），但各种制度和各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局面，在西夏王朝始终没有改变。这既是西夏多民族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也是党项王室为巩固自身统治所必需的。或者可以进一步地说，这也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多数兼营农牧业，或以牧业为主）创建自己的政权后，进行封建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在西夏王国中,这种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几乎表现在所有方面而且十分明显。它使西夏一代的文化内容丰富多采,而又别具特色。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西夏故地的大量考古资料,表现了这一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先进的中原传统文化(或称汉文化),通过兴庆府这个中转站广泛地传布到西夏全境。例如西夏朝廷在兴庆府设立刻字司,专门印制各种书籍。特别是用西夏文翻译《论语》、《孟子》、《贞观政要》、《孙子兵法》,以至《四言杂字》等汉文优秀书籍,印成书后散发各地,自然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有人说,西夏境内“凡是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①。这是说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词在西夏也非常流行。西夏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正如西夏学者骨勒茂才所说,这种西夏文字实质上也是“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②。北宋宰相富弼曾概括地指出:“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为中国等。”^③

以上一切生动地表明了,在以兴庆府为核心的西夏王国里,多民族的文化进行着大规模而又深入的交融。这显然有利于当年祖国大西北各族人民的互相接近和共同提高。这无疑是迁都兴州之后的党项西夏王朝,对多民族的祖国历史的一项重大贡献。

注释:

①《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

②《全唐诗》卷589。

③④⑩《西夏书事》卷10;卷11;卷12。

⑤《资治通鉴》卷218。

⑥《旧唐书》卷133,李昕传。

⑦《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⑧⑨《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

⑩见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载《元文类》卷50。

⑪表1资料根据历代宁夏地方志和宁夏水利厅编印的期刊《宁夏水利科技》,表2资料根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⑫《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⑬⑭《西夏纪》卷18;卷22。

⑮《文献通考》卷322,“古雍州”后按语。

⑯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卷150。

⑱见《宋史》卷277郑文宝传。又1975年台湾出版的《西夏史》认为“西夏食盐似尚未能自给,仍需仰赖宋之输入,故宋常以‘绝盐市’为之一要挟。”这正同史实相反(引文见该书第300页)。

⑲见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⑳转引自克恰诺夫:《唐古特西夏国的藏族和藏文化》,载《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陈炳应将该首西夏诗译作:“弥药勇健走,契丹缓步行,西羌敬佛僧,中国爱俗文。”见其所著《西夏文物研究》第348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㉑《西夏法典》,即《天盛年改旧定新律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其汉文译本。本文所引者分别见该法典第386、第387和235条。

㉒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3。

㉓《番汉合时掌中珠》序。

〔作者单位 宁夏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天明〕

党项王朝的佛教及其元代遗存

——帝师制度起源于西夏说

邓如萍 (著) 聂鸿音 彭玉兰 (译)

西夏仁宗漫长的统治时期(公元1139~1193年)跨越了大半个12世纪。在仁宗后期,党项人开始公开与吐蕃人和不屈服于蒙古人的草原部民站到了一边。仁宗与他的佛教僧侣,尤其是吐蕃高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了西夏帝师制度的产生。以居住在西夏王国佛教重地凉州的党项人、吐蕃人和蒙古人为媒介,帝师制度后来又重现于元朝。我对于这一媒介阶段的兴趣产生于探求党项人对西夏政教关系的理解。美国有些学者已经见仁见智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艾略特·斯伯林(印第安纳大学)收集了有关12至13世纪西夏史的藏文资料,而罗纳德·万·德·奎普(华盛顿大学)则已开始刊布其长篇巨著,研究元代首任帝师八思巴罗古罗斯坚藏(公元1235~1280年)的生平、事迹和声誉。在此,我将考察早些时候的政教关系,并试图推阐其向元代传播的内在关联。在文章开头我将作一简介,然后先叙述1247年的事,回过头来再谈仁宗。

继东亚的吐蕃王朝之后,西夏国(公元1038~1227年)的党项君主强有力地保护和发展了几个12世纪的藏传佛教宗派。到11世纪末为止,他们已把整部大藏经译成了西夏文。仁宗在位期间还监督了新经文的结集,同时又刊印和修订了汉文和西夏文的“西夏藏”。

在遍及东亚的政教关系中,党项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在1227年蒙古人征服了西夏王国之后,西夏文字并未就此而销声匿迹。14世纪初,元朝发愿刊布了整部的西夏经藏,1345年又刻制了居庸关的六体合璧铭文,除此之外,至少到16世纪初还有人继续使用西夏文来编集佛经。在明代早期(公元1372年)又印过一部西夏文本的《高王观世音经》,并列有发愿人和刊印者的名单。发愿文祝愿“当今皇帝万岁俱来,皇子太子千秋依见,国本坚固,民庶俱安,文武官宰,俱行忠德,有恩父母,当成佛道。”落款显然都是党项人名,但其地点不详。

1502年,一群党项信徒在河北保定府的稀什寺建造了两个佛教经幢,上面刻有陀罗尼经,用

族妇女对自身的婚姻大事并没有决断权;再加上回族社会传统的早婚习俗和大家庭的影响,回族妇女的婚龄普遍早于汉族,回族妇女往往在不到20岁的时候便开始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赡养父母、伺候丈夫、抚养子女、维持家庭生活,从而严重影响提高回族妇女文化水平的努力。

从本文的分析中我们认为,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和为妇女提供各种形式的就业和经济保障,是维护妇女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它也是影响妇女婚龄大小的关键因素。为真正实现这一点,就要坚定地反对“男尊女卑”和“大男子主义”才能达到。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谭 锋〕

以纪念沙弥巴答那征和比丘师的圆寂。造的这些东西并不仅仅是古玩，这些劫后残存的西夏文字其实与党项人对元朝的政治、文化影响密切相关。

凉州是本文的重点，所以在回过头来叙述党项帝师制度的起源之前，我先谈谈凉州的情形。

1247年的凉州

西夏灭亡20年后，有一群住在河西的佛教徒以某种方式依附了蒙古统治者，他们刊布了一部新版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或称《金光经》）。这个版本带有一篇由兰山（阿拉善）沙门慧觉写的长序，在第十卷末尾还有一篇由施主陈慧高写的较短的发愿文。陈慧高称蒙古为“大界国”，称他自己为大界国朝的“信众施主”。他说：“旧印版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公元1245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公元1247年）中刻毕，净纸上得以印施（印数不明）。”于是“德法重盛，佛事为新”。

即使是粗略地浏览一下R·E·埃默里克从梵文译为英文的《金光明最胜王经》，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内在意义。《金光明经》是写给统治者的。在其全部十九章中，最长的是第十六章“四天王品”，这也是经文的中心篇章。它向“每一位人君”展示了赞同这部佛经的责任和报偿，也展示了反对这部佛经的后果。第十二章是“大辩王神品”，它更加明确地发展了“君王科学”的主题。人们可以想象，负责刊布这部佛经的人是打算把这些内容转述给他们的新君主。

慧觉被看成是慈恩寺的高僧，而慈恩寺则是阿拉善高原上许多党项寺院中的一所，位于前西夏都城中兴府以西。慧觉置身此地暗示着与陈慧高及其信众之间的某种密切关系，这关系既有宗教方面的，也有地理方面的（还可能是亲戚关系）。慧觉的序言历数了这部佛经的整个翻译史，从译为汉文谈到在11世纪首次译为西夏文，在12世纪重译，以及“后因夏国冬出叶落为池，大界国兴，此经沉没。今下法三稳时至，四灭现遇，”此经当广为传诵，犹如治疗和恢复信仰的灵药。正如上面所引1372年的发愿文那样，慧觉也在序末的偈前祝愿“当今皇帝德盛福增，太子、皇子寿长无病”。（党项语的“皇帝”一词同样译自突厥语称谓“汗”、“可汗”，等等。）

1247年的这篇发愿文大概是对贵由汗而言的。贵由汗继其母后脱列哥那称制摄政和他本人西征还朝之后，于前一年刚刚登上汗位。窝阔台的次子、贵由的兄弟阔端统治着河西（党项故地）作为其封地。这里特别提到祝愿王子身体健康，是因为阔端患有慢性疾病。序言的写作日期在上下文中显而易见。

1239年，阔端将其官帐置于凉州附近。蒙古人在四川和陕西的军事目标促使阔端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进入西藏，这支部队的统帅是朵儿答答刺罕，他极有可能是个河西党项人。据特里尔·韦利说，朵儿答的任务是找个人把西藏交给蒙古人，并且替蒙古人统治这个地方。虽然1241年窝阔台之死使朵儿答的使命难以为继，但其努力却导致了阔端在1244年召请萨斯迦班底达公哥监藏（公元1182~1251年）。萨斯迦班底达携其两个幼侄（作为人质）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和恰那多杰于1245年启程，1246年抵达凉州，当时阔端正在外参加立贵由为汗的忽里台大会。1247年元月，阔端回来，接见了他的西藏客人。据萨斯迦世系上说，由于班底达有效地治疗了阔端的疾病，所以阔端开始对佛教产生好感，并将这几个西藏人安置在新建的幻化寺（SPrul Pa Sde）